

09

文史苑

(11)



- 鹿地亘在华的反战活动
- 张令澳与文史写作
- 周总理和百岁棋王谢侠逊
- 彝族女英雄秦德君
- 犹太难民在虹口
- 国旗设计者曾联松
- 我保存过鲁迅的信
- 悼念报坛前辈李秋生

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上海市虹口区委员会

文史资料委员会编

文 史 苑

(11)

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上海虹口区委员会
文史资料委员会编
一九九三年十二月

鹿地亘、池田幸子夫妇一九三九年在重庆

翁泽永先生提供



作者（左三）和鹿地亘（左一）1940年在重庆
欢迎反战同盟（文见8页） 张镜仪医师提供



长阳路摩西会堂（文见39页） 叶 弦摄



陈立夫先生与顾慰宁在台湾（文见152页）



曾联松近影（文见31页）



秦德君近影（文见92页）

目 录

张令澳与文史写作
鹿地亘的在华反战活动
国旗设计者曾联松

犹太难民在虹口
上海和犹太人的情谊

周总理和百岁棋王谢侠逊
悼念报坛前辈李秋生
我的邻居赵超构
恽逸群两获彗星称誉
追思先父李骏英
老报人钱仲易兄

张学良与东北义勇军
彝族女英雄秦德君
护送金兆梓越过封锁线
我所认识的陈彬和
“总统”选举闹剧目睹记

袁以勤(1)
张令澳(8)
陶 遂(31)
叶建生(39)
陈承融(53)

蒋是枢(60)
潘湛钧(66)
史良骥(75)
封光汉(78)
李昌道(80)
刘同葆(84)

任嘉尧(90)
徐家俊(92)
倪 俊(100)
何济翔(103)
沈立行(107)

我保存过鲁迅的信
上海戏剧遗产的整理
我与上海师专

陈 落(117)

蒋星煜(121)

周 尚(126)

虹口忆旧
广告史话拾零
虹口运动场所史实

沈立行(131)

袁以勤(141)

薛理勇(145)

海内外
两访陈香梅女士

(152)

梅武仪(158)

读者·作者·编者

(160)

张令澳与文史写作

袁义勤

〔编者按：张令澳的文史撰述是民国史的重要史料，深受海内外读者欢迎。《文史苑》前身的“资料汇编”，曾有幸最先刊登他的作品，现正筹编张令澳作品专辑《侍从室见闻》。兹特简介张老从事文史写作的缘由，供读者参考。〕

最近在《文汇报》（1993年8月14日第7版）上看到一则消息：南京大学“中华民国史研究中心”成立。这使我想起了张令澳先生。近几年来，他以耄耋之身，撰写回忆录，都是“民国史”后期的史实。不仅《人民政协报》、《联合时报》等报刊时有登载，香港《文汇报》也特约连载其长篇，台湾《传记文学》也转载多篇并约写专稿。他的文稿之所以为文史刊物所推崇，自然是由于史料翔实，鲜为人知。而这些他所亲见、亲闻、亲历的资料，又是与他做过蒋介石的幕僚这段经历分不开的。

从事幕僚文史工作

“八·一三”抗战爆发时，张令澳刚毕业于日本帝国大学本科农政系，当年便回国请缨。1938年在军事委员会政治部任中校收音室主任。后因邵毓雯（外交部情报司司长兼蒋介石侍从室秘书）的介绍，改任外交部情报司专员。不久，又得陈布雷的推荐，于同年冬被任命为侍从室第二处第六组专员（仍兼外交部专员），于是成为蒋介石幕僚中的一员。

第六组的任务是搞情报，既是情报总汇，也是侍从室的重要部门之一，直接对蒋负责。张任职将近4年，接触过不少高官要员、幕僚群与智囊团人物，所以他后来写的回忆录，屡有秘闻，翔实而生动。

抗战胜利时，张令澳被调离侍从室，随蒋经国赴东北工作了一年多。后来，张被任命为国民党台湾省党部副书记长（主任委员是丘念台）。1948年底，台湾省党部主任委员改为蒋经国，张令澳在上海看到他时，便问他何时赴台履新。蒋经国回答，目前还不能去，“要留在委座身边做他的Stick”。其时正是蒋介石退居溪口的前夕。

张令澳既曾在蒋政权的核心机要部门工作过，对于这部统治机器的运转规律，自然知之较深；对于这个政权统治下的腐败情况，也知之较深。淮海战役定局时，沪、宁的国民党机构已大谈“应变”。陈布雷自杀后，张考虑自身的前途，陷入徘徊苦闷之中。就在此时，他得到留日同学、老共产党员朱济仁夫妇的帮助，与中共上海市委第一工作队负责人吴克坚有了联系，不再返回台北。

解放后，张令澳在上海任中学教师，在“反右”运动中被错划为“右派分子”，加上历史问题，受到刑事处分，在青海柴达木盆地度过十七个春秋。1979年平反后，任上海虹口区业余大学日语教研组长、虹口区政协常委，并兼任上海社科院特约研究员、研究生部日语教授等职务，直至75岁退休后，受聘为上海市文史研究馆馆员。

他从事文史撰述，始于1985年。原国民党外交部的一位同事蔡端（蔡松坡之子），当时在全国政协编辑文史资料，特为写信劝他写些回忆录。于是张令澳发表的第一篇文史稿《一场“情报战”——日本投降前夕的蒋介石侍从室史料》，

见于上海市虹口区政协所编的《文史资料汇编》第二集（1985年11月）。紧接着，《人民政协报》予以转载。从此一发而不可收。后来，香港《文汇报》特约以《侍从室回梦录》为题，撰写长篇，在该报《采风版》特辟专栏，每日连载。上海《联合时报·史苑》也特辟专栏《桑榆偶拾》，以随笔形式，按期刊出他的史稿。台湾《传记文学》亦曾陆续转载了他的一部份文章，并特约撰写了一篇有关蒋经国的专稿。至今七、八年来，他在海内外所发表的文稿，累计达三十余万言。

刻意求实存真

张令澳在执笔写文史稿之初，也有人劝他，这种内容敏感性极强，何必招惹是非。他是背过历史包袱的，自然不是毫无顾虑。然而，当他看到有些自己所熟悉的史实，被一些作者在文章中以讹传讹，或者捕风捉影，出于臆测时，他作为知情人，总觉得难以安于缄默，总想实事求是，还历史以本来面目。有一次他与笔者谈起，最近《羊城晚报》上转载的一篇文章，其中引用台湾漆高儒所著《蒋经国一生》的内容，说黄中美是杀死章亚若的主凶，这纯属臆测之语，言下深有反感。对于维护历史的真实，他以为应该是知情人的“天职”。

不过，要在笔下为历史“传真”，也并非易事。形势总是会有变化的，有张有弛。而史实只能是“铁的事实”，毫无弹性可言，不能有丝毫出入。既不能为了某种需要，也不能为了个人利害，而随意褒贬，施上一点脂粉，或者抹上一些白粉。张令澳在这方面所执着追求的，是刻意存真。为此，他对于敏感性的问题不愿回避。在1985年开始写文史

稿时，第一篇写的是《蒋经国在东北》，约两万余字。一些文史刊物就是因为要回避当时认为是敏感性的问题，而搁置未用。以致这篇稿子几经周折，迟了两年，才在《奉化文史》上刊出。但他并不气馁，仍是坚持己见，照写不误。

写作的特色

回忆录的中心人物，是蒋介石。作者虽然掌握大量第一手资料，却无意从全面来写这个人物，也并未立出专章，集中地作正面介绍。而是以记事为主，对事件本身，写得源源本本，从而因事见人。通过许多事件与幕僚活动，来看发号施令的蒋介石，显得更具体、更实在、更深刻，而史料的完整性也较强。

不仅在大事方面，即在琐碎小事中也有反映。例如“官邸工作晚餐”，每星期一次，这是蒋介石利用吃饭时间，邀约一些高层官员与学者名流共餐，以听取意见或有所咨询，供决策参考。写这件事，就是为了写他的一种工作方式。又如一年一度的“感恩节”，有会餐，也有文艺会演。招待对象，是侍从室全体人员的家属。席间蒋介石对年资较深而默默无闻的事务人员，特别关怀，对他们的父母，亲切握手，殷致慰问。宋美龄则忙着赠送糖果、点心给孩子们。这件事正是写出了蒋介石抚慰下属、收揽人心的一种手段。

作者也以大量笔墨写人物，从侍从室的主任、组长，写到秘书，如陈布雷、唐纵、陶希圣等人（已发表者有十余人）。从这些“幕僚群像”中来看蒋介石，颇有人物烘托之妙。例如陈布雷，是侍从室第二处主任，一位幕僚长。他身处国民党最高权力的核心，却处处小心翼翼，在国民党内部派系斗争的漩涡里，始终抱不介入态度，时常以杨永泰的

结局为前车之鉴。1934年前，杨永泰在南昌行营时期，身为蒋介石的秘书长，红极一时；却在派系斗争中遭忌，迨调任为湖北省主席不久，便被刺身亡。从此以后，蒋为了平衡各派系之间的利害，觉得再不宜选用色彩太浓、怀有政治野心的人物作幕僚长。因而陈布雷便被赏识，继膺幕府的重任。陈五十岁生日时，蒋介石曾亲笔书赠“宁静致远，淡泊明志”以祝贺。陈看到蒋借用诸葛武侯的名言来比喻自己，更加激发起“士为知己者死”的感情。再如，唐纵是第二处第六组组长，所任要职，是直接为蒋介石处理情报与特工。他平时对揣摩蒋的意图与作风，总是狠下功夫。经常守口如瓶，不露锋芒，在侍从室中参加会议，极少发言，勤于笔记，会毕即走，很少与别的组长或秘书闲谈或交往。因此在将近十年的组长任内，越来越得到蒋的信任。后来唐纵便“当选”为国民党中央执行委员，并出任内政部次长、警察总署署长。从以上两例，对于蒋介石的性格及其用人之道，也可见一斑。

从行文来看，堪称生动洒脱。以野史的笔调，娓娓道来，有文采而无雕饰。在自然、流畅中引人入胜，可读性很强。

来自“反馈”的信息

有些文章，由于参考价值比较高，常被转载或引用，也往往有信息反馈。

例如，距日军偷袭珍珠港三个星期以前，国际问题研究所所长王芃生，曾获得一份日军大本营准备发动东进及南进攻势的绝密资料，由中国政府密告美方，惜未被重视。后来以讹传讹，有谓该项情报为军统戴笠提供，有谓是毛庆祥的

特种技术研究室破译而来。1988年12月14日《解放日报》的一期《新论》，登载了《珍珠港事变的情报是谁上报的》一文，加以澄清。作者胡又深就是引用张令澳所写《王芃生与国际问题研究所》的内容，作了证实。

又如，关于“史迪威事件”，已往发表过的文章，大都是美国方面出版的一面之词。张令澳在《蒋介石与史迪威》一文中，根据亲见亲闻，不仅对当时国民党政府的处境，以及蒋介石最后“摊牌”的决心与过程，详加叙述；而且在龃龉情况方面，也有些细节记叙，有助于对事件真相的了解。

再如，《蒋介石经略西藏始末》（刊于《文史苑》第10集，《人民政协报》摘要转载，题为《国民党政府经营西藏始末》）一文，记述侍从室第四组秘书沈宗濂，1944年奉命出任“国民政府驻西藏办事处”处长后的活动，以及沈有一封交蒋介石亲自审阅的绝密电文。该电建议：迅速消除川、康地方势力，以修建康藏公路；并在联合国支持印度独立，以使独立后的印度承认西藏为我领土一部份。这一段史料，知之者甚少。沈宗濂的女儿（沈学钧，杭州大学旅游系副教授）阅报后，曾致函张令澳，说对她父亲的这段重要经历，原先毫无所知，深表感谢。同时，密电内容，也引起海内外研究西藏问题史者的注意。

再如，张令澳在侍从室时，曾与邵毓麟共同代表中国政府方面对当时的“韩国临时政府”主席金九以及国务委员车锡利、闵石麟等诸多领袖人物，有过长期接触，熟悉其内情。金九于1949年逝世，1989年第6期《上海滩》杂志所载张的《传奇式人物——金九》一文，为研究这方面历史者提供了一些资料。1993年4月，由大韩民国驻上海《三星集团》出面主办的“韩国临时政府上海原址落成，临时政府成

立74周年纪念”宴会，即曾特邀张出席参加。

还有，台湾《传记文学》主编刘绍唐，曾特约张令澳撰写专稿，并在“编辑后记”中介绍：“……张先生最近因赴香港探亲之便，见本刊读者对蒋经国留俄同学曾在赣南任主任秘书之黄中美生死下落表示关切（传闻黄为杀死章亚若之主凶），特在旅途中撰写《蒋经国周围留俄同学杂忆》长文，以答本刊读者……”（上文所提“章亚若”，即蒋经国在赣南婚外恋的对象）。

以上略举数例，可见有关方面的重视。因而颇多文史刊物都频频向他约稿。

1991年，张令澳在沪身罹车祸，骨折腰伤，动了两次手术，卧床一年余，在休养中还扶病为《文史苑》供稿。他已视文史写作为一种乐趣。这是以贡献为乐趣。他的三十余万字的回忆录，丰富了民国史的研究内容，不能不说是一大贡献。

（1993年9月）

鹿地亘在华的反战活动

张 令 澳

本刊特稿

参加中国抗战的日本人

鹿地亘（1903—1992）出生在日本九州鹿儿岛，这个地方地处日本西南端，民情强悍、方言难懂，历来以产生武士和军人而著名，然而鹿地亘恰恰相反，早在东京帝国大学求学期间即参加大正年间日本左翼文学运动，成为早期日共党员之一。据他自言曾担任过被取缔后秘密出版的《赤旗报》主编。“九·一八”事变以后，遭日本警察追捕未曾落网。他的夫人池田幸子是一位日本进步歌舞团的舞蹈演员。大约在1935年左右，夫妇两人随着这个歌舞团到青岛演出，逃离了日本，不久就流亡到上海，后来通过在沪日本作家增田涉的介绍，认识了鲁迅，并由于鲁迅的关系与中国左翼作家如胡风、冯雪峰、黄源、艾青等有了接触，以研究当代中国进步文学并翻译介绍一些著名作品，化名投刊于日本文艺杂志，博取稿费而谋生。

1937年，“八·一三”中日战争爆发，日本在上海的秘密警察加紧对居留上海的日本左翼作家侦缉活动，鹿地亘处境危险。他经中国友人的帮助，由宋庆龄领导的世界人权保障大同盟，送他和夫人一起逃往香港躲避。在那里他结识了郭沫若、夏衍等文化界著名人士。

1938年2月，国民党政府军委会在武汉成立了政治部，

为进一步体现国共合作的精神，任命陈诚为政治部部长，周恩来、黄琪翔（第三党）为副部长，郭沫若为第三厅厅长。

第三厅主管抗战的宣传工作，设有文字宣传的第五处，处长胡愈之；艺术宣传的第六处，处长田汉；对敌（日本）宣传的第七处，处长范寿康（不久即离去）。在第七处下又有敌情研究科，科长为杜国庠；对敌宣传科，科长为冯乃超。第三厅在郭沫若的主持下，网罗了全国文化艺术界的许多精英，如戏剧家洪深、马彦祥、石凌鹤；音乐家冼星海、安娥、书画家傅抱石、李可染、叶浅予；文学家阳翰笙、廖沫沙；电影界的郑君里、袁牧之、陈波儿，教授张志让、专家常任侠等等，等等，真是人才济济，不胜枚举。此外，政治部还有一个设计委员会作为咨询研究机构，由各方面推举杰出人才聘为设计委员，与三厅有关的设计委员，有夏衍、孙师毅、老舍、许宝騄等。

鹿地亘流亡在香港，作为中国的友人，迫切希望能来中国内地参加轰轰烈烈的抗战工作，为世界反侵略战争尽一分力量。于是经过郭沫若和陈诚商量，由宋庆龄发起的“保卫中国同盟”出面推荐，鹿地亘夫妇在第三厅成立不久就来到武汉。陈诚聘他和池田幸子同为设计委员，参加第三厅的对日宣传工作。当时阳翰笙、夏衍、田汉、冯乃超等和他相见之下，都表示热烈欢迎；而鹿地亘夫妇也因为三厅里有许多日本留学生和进步的文艺界人士与他共事，感到十分亲切和兴奋。

初期的对日反战宣传

笔者那时已从军委会主办的“留日归国学生训练班”结业，因在班中日语考试名列前茅，被分配到新成立的第三厅